

倡导新型理念 共筑美好世界

核心阅读

我们正在经历包括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正处在孕育新生的前夜。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倒行逆施解决不了自身痼疾，更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 王洪涛

7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发表题为《让美好愿景变成现实》的重要讲话，在金砖国家合作努力开创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历史门槛上，吹响了继往开来、携手并进的冲锋号，向世界贡献了一系列新型理念，引领全人类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自2009年在叶卡捷琳堡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以来，金砖国家合作已走过“金色十年”，在国际金融危机阴霾之下，不断深化拓展经贸财金、政治安全和人文交流合作，携手并进实现共同发展，与发达国家同舟共济，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推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改革，设立面向发展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问题上显示了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强大力量，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并重回增长之路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今，世界经济进入复苏新周期。发达经济体复苏强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虽然不如发达国家，但总体也在稳步复苏。同时也要看到，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我们正在经历包括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正处在孕育新生的前夜。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的一些国家非但没有抓住机遇把第四次工业革命再向前推进一步，反而陷入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的窠臼。“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倒行逆施解决不了自身痼疾，更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习近平主席指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这是世界秩序系统性转型的关键阶段。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新型理念既是推动金砖国家深化“三轮驱动”合作的灵丹妙药，也是引导世界秩序系统性转型，推动构建更加美好世界的中国方案。

（上接1版）
在贫困村屯基础设施上再完善。针对贫困村屯不同程度存在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上网难等问题，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村屯道路建设攻坚战，持续抓好贫困地区“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建成外通内联、通畅畅乡、客货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打好安全饮水攻坚战，实施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不断提高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解决群众“靠天喝水”问题。打好电力改造和网络宽带建设攻坚战，让贫困群众用得起、用得好宽带，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为脱贫攻坚插上信息化“翅膀”。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持续抓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扎实推进改厕、改厨、改圈，加快村屯“硬化、净化、绿化、亮化、美化”，建设美丽乡村。

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上再提升。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大力推进教育项目建设，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全面做好控辍保学工作，使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提升基本医疗保障水平，进一步降低贫困人口医疗负担，推进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开展贫困人口大病和慢性病精准救治。提升住房安全保障水平，建立农村危房改造信息和台账动态调整机制，因地制宜推广农房加固改造，鼓励通过闲置农房置换或长期租赁等方式，兜底解决特殊困难群体基本

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合作是金砖国家合作的重头戏，新型全球化是合作成功的关键。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其实质是对传统全球化进行扬弃的新型全球化。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立，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取决于世界各国抉择的合力。有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有人却走错了方向而不自知。金砖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就一直同舟共济，现在还要共同应对某些国家的过河拆桥，理应共同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

政治安全合作既是经济合作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金砖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其核心就是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主席在此又作了强调。旧的国际关系由西方主导，渗透着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虽然倡导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价值观，但是实践中大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稳定。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人类的前途命运已经到了重要关头。为此，我们要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敦促各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新型安全观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倡导共同、综合、合

住房安全问题，让更多贫困群众住上新房。
在推进扶贫协作上再提速。主动对接、深入落实扶贫协作框架协议和扶贫协作规划，持续实施“携手奔小康”行动，加大产业、劳务、教育、医疗、生态等方面协作力度，带动和帮助对口帮扶地区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以扶贫协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广全方位合作，主动融入对接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同推进珠江—西江经济带、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等重大平台建设，促进两广经济一体化发展，以经济发展推动脱贫致富。

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为如期全面脱贫提供坚强保障

压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督促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增强政治担当、责任担当，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抓牢一把手这个“牛鼻子”，坚持市委书记遍访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乡镇、县（市、区）委书记遍访贫困村、乡镇党委书记和村党组织书记遍访贫困户，把问题找准，把难点找准，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把脱贫任务落到实处。加强贫困村党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基础，也是破解安全困境的有力武器。新安全观之“新”，首先在于超越冷战思维，摒弃以对抗求安全的思想，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冲突。当前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尚未解决的矛盾和新出现的矛盾叠加激荡，安全问题表现出许多新的内涵和新的形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为此，中国主张，各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样才能共同营造人人享有安全的局面。

新型南南合作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将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努力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创造更大机遇。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本质就是新型南南合作。南南合作发展至今，其合作内容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过去的经济技术合作扩展到经济分享、理念交流、国际重大问题和全球治理过程中相互支持等方面，开展新型南南合作非常必要。新型南南合作的“新”，主要体现在深化升级经贸领域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促进能力建设、加强价值理念交流互鉴、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等方面。特别是要突出以开放发展为导向的合作，要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在金砖国家合作平台上倡导并践行新型理念，这是中国智慧和经验的国际转化，更是中国的大国胸怀和大国担当，必将为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增添更大的动力。

战略视角

组织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建设，使其成为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心骨”“领头雁”。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对重视不够、组织领导不力、工作成效较差的党委和党组织书记进行约谈，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压实基层一线工作责任。发挥好综合性督查、“红黑榜”通报等机制作用，完善考核评估工作，推动县乡干部和驻村干部自觉承担责任、认真落实政策，按时按质完成脱贫任务。深入开展“一带一联”工作，督促干部职工履行帮扶贫困户、联系贫困户学生责任。完善“一户一册一卡”帮扶模式，充分发挥帮扶手册和帮扶联系卡作用，如实记录和反映政策宣传、帮扶计划、联系对接、措施落实等情况，使帮扶干部的帮助进展和工作成效看得见、可监督。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督促扶贫干部既过得硬、立得住，又沉下去、干出来，更好地带动贫困群众富起来。

推动各方承担社会责任。深入开展定点扶贫工作，督促帮扶单位加强资源投入，落实帮扶责任。广泛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引导各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等。大力宣传脱贫攻坚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引导社会力量和爱心人士积极捐款捐物、开展志愿服务，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局。

印度最具影响力的知识产权专家马舍尔卡曾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如果印度发展得当，它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上头号的知识生产中心。”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趋势性判断，原因在于印度形成了较具特色的创新体系。

创新模式特色——隐形创新

印度用自身独特的案例告诉我们，对于创新形式的认识应该突破原有的窠臼。创新不一定非得是大众都知道的创新，不一定非得是针对应用市场和终端用户的“终端创新”，也可以是制造产品的新工艺方法乃至新的组织管理和营销商业模式等“过程创新”。面临成本和竞争的压力，大量印度企业正致力于高附加值研发服务——“隐形创新（Invisible Innovation）”而非“显形创新（Visible Innovation）”。其根本原因在于，终端品牌的打造需要巨额资本投入，而这些资本投入很可能难以收回成本；同时，一旦这些企业进入终端市场，原有的大量客户随即转变为竞争对手，从而置自身于不利地位。因而，这些印度企业甘愿做终端品牌背后的“隐形创新者”。

例如，DenuoSource公司开发了选址分析产品，将新商店的选址分析和销售预测转变为一门科学；采用规范系统的算法，帮助零售商、购物商场、快餐饭店、房地产开发商等商家选址；通过将地理销售、门店特点、人口等数据嵌入软件，告诉运营商是否值得花费时间、精力、资本来重新选址，从而增加他们运营成功的概率，获得更大收益。巴拉特锻造公司（Bharath Forge）则通过引进全自动生产流水线和新机器，从1989年拥有85%蓝领工人的手工锻造工厂转型升级为2000年拥有85%白领工人和700多位工程师的机械锻造企业，从而提升了锻造质量和速度，锻造时间降到欧美企业类似项目的三分之一。

由此可见，相对于“显形创新”而言，“隐形创新”同样是具有力量的创新，同样能够创造出无穷的生产力和冲击力。同时，这种看不见的“隐形创新”对终端“显形创新”具有相当大的溢出效应。印度在其“隐形创新”中积累的技术和能力，通过企业家精神引领、雇员流转、副产品溢出、新机遇创造等途径，有助于培育出大批才华卓越的商业领袖和技术精英，从而间接地孕育出最终的“显形创新”。创新是一个由小到大、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只有从小创新起家，未来才可能胜任更大的创新。

创新路径特色——逆向创新

在印度，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有着多重内涵，如节俭式创新（Frgal innovation）、低成本创新（Low-cost innovation）、包容性创新（Lnclusive innovation）或拼凑式创新（Jugaad innovation）。

2006年，法国雷诺汽车公司CEO卡洛斯·戈恩最早使用“节俭式工程（Frugal engineering）”来描述印度塔塔公司NANO汽车的研发工作，意指在尽可能低的成本条件下进行工业设计和制造。此后业界和学术界使用“节俭式创新”来特指那些专门为新兴市场中低收入群体开发的可负担的产品与服务。深受“甘地精神”影响的印度最早兴起了“节俭式创新”潮流，对传统创新范式进行了根本性颠覆并取得了较大成功。印度医院正在着力打造“世界级水准的超低成本医疗”，他们专门从精挑细选的高成本技术入手进行逆向创新。此后Immelt提出“逆向创新”，即为新兴市场而创新开发的节俭式产品首先在发展中国家采用然后推广到发达国家的现象。Adjou等进而运用“拼凑式创新”来表达应对挑战的独特思维和行动方式，强调灵活地思考和行动，在逆境中寻找机会，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这一系列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

印度式“逆向创新”存在着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从产品性能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印度老百姓收入很低，因而他们情愿牺牲产品的性能来换取公正的价格——如以15%的价格获取50%的解决方案。从消费者偏好来看，印度的客户有其特殊的品位和喜好，如百事可乐针对印度消费者研发了一种新的小扁豆休闲食品。从基础设施来看，印度的硬件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因而印度的技术设施建造者反而能直接采用前沿的解决方案——如在电力不可靠的情况下，便携式心电图机得以应用；在没有固定电话的前提下，印度电信直接跨越至无线技术。从发展可持续性来看，印度更渴望也有更多机遇找到新一代的环境解决方案。从政府监管来看，印度的监管系统不甚完备，但企业为市场提供创新解决方案时不会面临太多的延误和阻碍。总而言之，“逆向创新”在印度盛行源自三大因素：一是文化因素——印度历来有一种文化被称为“Jugaad”（北印度语，指聪明的即兴创作）；二是社会因素——印度贫富差距正不断拉大，但低收入人群也强烈渴望在卫生、教育、能源等领域享受到低价格、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三是包容性科学和创新政策的制度推动。

印度创新特色面面观

□ 周及真

创新主体特色——草根创新

印度自独立以来就有持续不断向发达国家“人才外流”的趋势。但近年情况有所改观，“人力资源”出现回流，特别是印度年轻人。思科、英特尔、通用电气、IBM等超过200家大型跨国企业都已在印度建立了研发中心。印度班加罗尔的John F.Welch科技中心，是通用电气（GE）在全球建立的最大研发基地，拥有2300个雇员，其中700名印度年轻人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正是这些印度年轻人不断进行工作流程创新，奠定了印度企业内“草根创新（Grassroots innovation）”的基石。

印度管理学院教授阿尼尔·古普塔（Anil Gupta）于1988年创办了“蜜蜂网络（Honey Bee Network）”，通过各种方式搜寻民间“草根创新”。发掘出的各种民间“草根创新”充分展现了民间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完全是由市场需求激发的；为突破资源匮乏之窘境，印度民间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如用陶土制作不用电的冰箱、拆掉废旧随身听上的马达来带动风扇、发明节水水泵等等；仅与自行车相关的创新就有几十项，如水陆两栖自行车在水患频发地区有巨大的应用前景。“蜜蜂网络”搜集到这些创新后，按标准格式输入数据库，任何人都可在网站上查询这些草根及其创新者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从而实现创新产业化。例如，一个印度农民发明了简易有效的爬树装置，通过“蜜蜂网络”而被一个美国生物学家采购，用来攀爬树木采集标本。

为鼓励和推广更多的民间“草根创新”，“蜜蜂网络”推动成立了其他几家机构，共同构建一个创新支持体系。1993年，印度可持续技术与机制研究社（SRIS-TI）成立，为民间“草根创新”提供资源对接、专利申请等支持性服务。1997年，“蜜蜂网络”和古吉拉特邦政府联合成立了“草根创新推动体（GIAN）”，实现孵化器功能，将草根知识和主意转化为产品。2000年，在古普塔的大力推动下，印度政府出资500万美元成立了“印度国家创新基金会（NIF）”，致力于鼓励民间“草根创新”，每年举行一次全国范围创新大赛。“蜜蜂网络”还与高校合作，创立了“科技维基（Techpedia）”，鼓励大学生参与解决贫困人口面临的各种需求和问题。

古普塔将“蜜蜂网络”的模式称作“G2G模式”（Grassroots to General），它已帮助很多民间“草根创新”在更广泛的地区内得以应用，甚至冲出印度走向世界。经过近30年的发展，“蜜蜂网络”已收集记录了超过十万个民间“草根创新”，成为世界最大的民间“草根创新”数据库；它从一家印度本土机构扩展成为一个全球性平台，包括中国在内的75个国家参与其中。在惠及亿万穷人的同时，“蜜蜂网络”通过实践向世人表明：必须尊重和重视本土人民的智慧，通过各类政策和制度来推进民间个人创新发展，因为穷人不仅是发明创造的消费者，他们本身就是创新的促进者。